

# 全球化时代历史教科书领域中的国际交流

## — 以日本史中有关“元寇”的表述为例 —

野口周一<sup>a</sup> 郭海良译<sup>b</sup>

<sup>a</sup>湖北短期大学 <sup>b</sup>华东师范大学

### 【キーワード】

全球化时代 历史教育 元寇 蒙古来袭

### 前言

近年来，“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要问人们是否准确地理解了这一词语的真正含义，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之所以会这样，因为我们有过类似经历。曾几何时，“国际化”一词也受到过人们的追捧，人们也曾就实现“国际化”的途径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然而，人们却始终难以理解“国际化”的目的。<sup>1</sup>

本文所涉及的“蒙古来袭”是以东亚为舞台上演过的历史事件，在日本的历史教学中，也曾是“日本史”和“世界史”这两个科目共同涉及的内容。笔者在此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那些被称为“有识之士”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譬如，渡部升一在其《初遇国难·元寇一胜者的悲剧》<sup>2</sup>一文中，以自己孩提时代的体验为例，说出了如下感受：“不知道为什么，最恐怖的就是蒙古了。”<sup>3</sup>作者在此坦率地表白自己的内心感受自然无可非议，然而紧接其后就出现了一个所谓“东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日本”的标题。作者继续写道：“忽必烈汗，即元世祖想让日本成为附属国的时候，一开始好像觉得这

事很简单。由于先前朝鲜半岛几乎毫无抵抗地屈服于元朝的威严，或许他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对付此后的那些岛屿只需稍加威胁就能使它们屈从。”<sup>4</sup>这段表述稍微随便了一点。

本文将在笔者下列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 A、《东亚世界中的“蒙古来袭”》<sup>5</sup>
- B、《明治时期以来历史教科书中的“蒙古来袭”小考》<sup>6</sup>
- C、《关于“蒙古来袭”的相关插图》<sup>7</sup>
- D、《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蒙古来袭”的插图一览表—以筑波大学所藏教科书为例》<sup>8</sup>

在以上所列4篇论文中，A篇和B篇是主要参考。此外，以下两篇论文也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 E、《富利亚与萨克拉美术馆访问记—以参观“蒙古袭来绘词”为例—》<sup>9</sup>
- F、《对确立异文化社会之间人际关系理论的建言—兼论历史教育的重要性》<sup>10</sup>

### 一、“蒙古来袭”及其相关问题

#### 1、何谓“蒙古来袭”？

我们在此先要对所谓“蒙古来袭”稍作说明。在上述A论文中，笔者引述了《岩波日本史辞典》中

<連絡先>

野口周一 noguchi@shohoku.ac.jp

“文永·弘安之役”<sup>11</sup>条目的内容。之所以引用这本辞典的内容，一是因为从发行时间上看该辞典比较新，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因为该辞典条目的字数比较适中，便于引述。

在本论文中，笔者将引述《日本历史大事典》第3卷中“文永之役·弘安之役”（海津一郎所撰）条目的内容。该条目全文共1700字，开篇就这样写道：“指元朝忽必烈汗征讨日本期间，北九州沿岸地区遭受侵犯的1274年（文永11年）和1281年（弘安4年）间的军事冲突。当时被称之为‘异国（异贼）会战’或者‘蒙古（人）来袭’。幕府末期和近代以来，随着国防意识的提高，作为强调元朝侵略性的术语，‘文永·弘安之役’和‘元寇’等说法逐渐被固定下来。”<sup>12</sup>

在以上所列论文中，笔者将“蒙古来袭”的相关问题归纳为以下7个方面。本文将参照梅津一郎撰写的上述条目内容，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①关于“蒙古的国书”问题的表述，并没有涉及其具体内容，只是这样写道：“六度遣使要求日本臣服，皆被镰仓幕府拒绝，因而决意进犯。”

②关于“蒙古军的战术”的表述：“面对使用毒箭和火药弹等稀有武器、且采取训练有素的集团阵战的元军，日本军苦战之后不得不退至大宰府附近。”

③关于“文永之役始末”的表述：“当天半夜，已回到停泊在海上的舰船之中的元军遭到暴风的袭击，损失惨重，撤回了高丽。”

④关于“文永之役以后幕府的对策”的表述：“1276年（建治2年）春，幕府为了加强海防，计划出兵高丽（异国征伐）。他们动员九州的武士，并在海岸边铺设石块，构筑前沿阵地。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异国来犯的轮岗警戒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九州地区各诸侯国必须轮流负责博多附近地区的警戒任务，时间为每年3个月。”

⑤关于“弘安之役始末”的表述：东路军的主力于6月6日到达博多湾，“在这里与幕府军展开了

海陆两栖作战。由于遭到顽强抵抗，因而放弃了登陆计划，退回了壹岐岛”，江南军“在平户附近与东路军会师，于26日占领了位于伊万里湾的鹰岛。然而，自30日半夜至闰7月1日（儒略历8月16日）台风掠过该区域，海上的元军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撤回了高丽。”

⑥关于“第3次远征日本”的表述：“忽必烈征讨日本战略继续实施，元军开始进攻萨哈林的阿依努人和琉球（一说台湾）。幕府也在博多设置了防范异国征伐的机构—镇西探题，军事紧张局势持续不断。然而，由于亚洲各国的抵抗和蒙古人的内部纷争，征讨日本战略最终并没有实现。”

⑦关于“蒙古来袭的影响”的表述：“以律宗为代表的寺院和神社势力大肆宣扬‘台风乃诸神显灵’的论调，将日本视为神国的观念由此而普及开来”，“幕府以这场战争为契机，强化了寺院、神社以及当地居民等的统治权，并由此形成了以幕府将军权力为主导的、团结整个领主阶级力量的政治路线（安达泰盛的弘安德政）”。

在参考学术界现有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从上述7个方面的表述中可以归纳出如下6种观点。

首先、在关于“蒙古国书”的问题上，该信件了口气是否真像传说的那样无礼或傲慢？大致而言，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认为是比较温和的，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们则认为是一种威吓。其次，在关于“蒙古军队的战术”问题上，根据众口一词的说法，日本军队在蒙古军队的火器和集团阵战面前表现得一筹莫展。再次，在关于“文永之役始末”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蒙古军队是因为暴风雨的缘故才撤退的。最后，在关于“文永之役以后幕府的对策”问题上，众所周知的是出兵朝鲜半岛、构筑石垒阵地以及设置防范外敌入侵的轮岗警戒制度。另外，在“弘安之役始末”的问题上，一般都认为这次又遇上暴风雨，大部分蒙古军队葬身海底，残余部分被日本军队歼灭。至于“第3次远征日本”，则普遍

认为这个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施，原因就在于人们所谓的“亚洲的协力合作”或者“亚洲的联合行动”。

## 2、问题所在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拙文A中所述学术史的某些内容，并参考最近出版的学术新作《元寇与南北朝的动乱》<sup>13</sup>中的有关篇章，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 (1)关于“蒙古国书”

1965年，作为中央公论社策划出版的《日本历史》系列丛书（共有26卷）的第8卷，黑田俊雄所著《蒙古来袭》一书出版上柜，立即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据说读者多达数十万人。在此先介绍一下该书中的相关内容。

黑田俊雄明确地指出：“那么，蒙古国书（世祖诏书）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幸好东大寺里保存着它的抄本，其中开篇写道：‘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毋庸置疑，这是一种蔑视日本、妄自尊大的口气。”<sup>14</sup>在列举了国书全文并稍作评注之后，作者接着写道：“实质上就是一种彻底的服从，无论怎样善意地解读，它只是在要求‘眼下的友好国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sup>15</sup>

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此又是怎么理解的呢？石原道博在其编译的《旧唐书·倭国日本传、宋史日本传、元史日本传》中分析道：“（该国书）读来立刻使人感到它与迄今为止汉族国家的帝王诏谕如出一辙”。<sup>16</sup>在石原道博之前，爱宕松男却在其《忽必烈汗》一书中指出：“（国书）使用了蒙古大汗不常对外国君主使用的诚恳的措辞，并没有赤裸裸地表示出诸如‘不降即战，结果只有天知道’之类的威胁或挑战之意。”<sup>17</sup>

杉山正明著有《大蒙古世界》和《蒙古帝国的兴亡》两部大作。他指出道：“迄今为止一般都认为，由于该书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的无礼和威胁，因而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不得已之举。然而这却是一种误解。该书信被收录在《元史·日本传》、《经世大典》的‘序录’、‘征伐’以及‘日本’等条目之中，在东大寺里也有该国书的抄本。实际上，它

的语气非常平和，只是为了谋求修好而已”，“至于被视为傲岸不逊的开头语——‘上天眷命’一词，也只是蒙古式文章开头语的固定汉译表现方式而已，而且是向日本国王‘奉书’，这种低调的姿态实在令人吃惊。”<sup>18</sup>关于书信末尾的结语——“不宣”一词，杉山正明解释道：“《元文类》第41卷收录了编纂于5年之前的《经世大典》中各篇的序文，其中的‘日本’条目所收录的所有送往日本的国书末尾的‘不宣白’，是表达‘不视为臣下’之意的结语。”<sup>19</sup>

杉山正明的功绩在于对开头语中“奉”字和结语“不宣”一词所做的启蒙式解释。然而，在杉山正明之前，川添昭二在其名著《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中其实早已阐述过类似的观点。<sup>20</sup>

最后，在爱宕松男和石原道博两位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启发下，笔者认为，无论是“奉”还是“不宣”，都只是一种格式而已。然而，小林一岳在对“不宣”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的同时，却又貌似全面地指出道：“尤其是最后的‘用兵……’这种威胁性语言，其实就是直接向日本显示蒙古的威胁。”<sup>21</sup>换言之，小林一岳也像许多学者那样，认为该国书中确实包含着恫吓日本的意思。<sup>22</sup>

### (2)关于“与亚洲的联动”

关于“蒙古来袭”在亚洲历史上的定位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何理解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的原因开始说起。

#### I 关于文永之役的原因

爱宕松男在其《亚洲的征服王朝》一书中指出：“元朝向日本派遣国书使者始于至元3年，这正是元朝已经将讨伐南宋定为国策之后的事情”，因而“就有必要结合其对南宋的用兵政策来考察元寇的问题。”<sup>23</sup>

作为与爱宕松男持同样观点的研究，稻叶岩吉的《日丽关系》<sup>24</sup>和松井等的《黑山岛与元寇》<sup>25</sup>值得关注。

杉山正明在其《大蒙古世界》中写道：“毫无疑问，这是对南宋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间可以证

明这一点。至元10年(1273)襄阳和樊城陷落以后,忽必烈政权就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向南宋发动全面进攻。同年年末,以品都为总司令官的驻守高丽的蒙古军团,也动员了驻守高丽周边地区的蒙古军队,跨海进攻耽罗。在歼灭了与之为敌的三别抄之后,朝鲜半岛周边海域全部落入蒙古人之手。”<sup>26</sup>

在此有必要对所谓“三别抄”略作说明。三别抄就是驻扎在江华岛的高丽守备军,1270年,当蒙古军队再次入侵高丽的时候曾爆发起义。后来,他们占领了耽罗(即济州岛),控制了该区域的海上贸易,与高丽和蒙古的联军形成了对峙状态。1273年,三别抄遭到镇压。

杉山正明继续写道:“耽罗既是通向日本和南宋的通道,其中央部分的高原状草原地带又可以提供绝好的放牧场,同时还是独一无二的海上军事基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驻军此时频繁地向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域的黑山群岛派出调查船。当然,这也包含着为远征日本进行探查的用意。一旦经由黑山群岛南下,即可抵达南宋的心脏地带—长江下游地区。毫无疑问,这是为计划中的至元11年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做准备的。”<sup>27</sup>松井等提出的观点在跨越了70多年的时空之后,再次遇到了知音。

小林一岳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攻击目标是南宋,所有针对高丽和日本之举,都只是为了孤立南宋而采取的迂回作战。”<sup>28</sup>

## II 关于弘安之役的原因

杉山正明在《大蒙古世界》中指出:“在第二次远征军中,有一件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奇的事情,那就是从江南地区出发的一支大军,号称10万。从高丽发兵的东路军人数为4万,如果加上水手的数量,实际上与第一次远征军的人数差别不大,人员结构也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点非常关键。”<sup>29</sup>接着又对这支江南军团做如下说明:“10万江南军团原是南宋的职业军人。忽必烈政权在几乎未经战事的情况下接收了南宋的地盘之后,在江南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如何处置这数十万未受损

伤而投降的旧南宋军队。他们虽然都是登记在册的正规军,但是其中也有许多老兵和无实战经验的弱兵。然而,既然是职业军人,他们就都是靠着南宋政府的津贴维持生计的。如果听任这些数量庞大的人群处于无业状态,迟早都可能成为一种极大的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原因。”<sup>30</sup>

关于这支原南宋军队的裁减问题,重松俊章早在其《中国人眼中的元寇之役》<sup>31</sup>一文中就已经指出了这种裁军的可能性,爱宕松男在《亚洲的征服王朝》一书中也有相类似的论述。在当时的学术界,这样的解释似乎已成为共识。

另外,在关于这支江南军队的具体用途问题上,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政权从这批旧南宋军队中挑选出善于实战的精兵强将,或者编入中央政府的直属军团,或者投入蒙古高原和中亚细亚战场前线,或者转拨给广东和广西的镇守军团。然而,对于难以安置的剩余人员,政府则从中招募志愿兵,然后将他们派往海外。10万江南军团,其实就是一支这样的军队。不仅如此,据说除了负责监军的蒙古人和汉人士兵之外,这支军队中的其他人员几乎都是不带武装的。他们携带的不是武器,而是准备到日本来拓荒的农具。江南军团徒有10万人的浩荡规模,就其内容而言,简直就是一支移民船队。”<sup>32</sup>鉴于这支军队中的大多数人是带着农具到日本来的,杉山正明指明了他们“移民船队”的性质。小林一岳也完全赞同这一观点。<sup>33</sup>

## III 关于“第三次蒙古来袭”问题

忽必烈后来还曾经多次策划过对日本的远征,最终却都未真正付诸实践。究其原因,片仓穰认为应该结合当时与占城之间的关系来考察,<sup>34</sup>杉山正明则写道:“其原因就在于至元24年(1287)爆发的、以广宁王乃颜为首的东方三王之乱。忽必烈面临着因举兵以来的同盟者反叛而造成的最大危机,因而根本无暇顾及远征日本的事情。包括高丽方面军在内,原来准备用于远征日本的军队被接二连三地投入到了北方战场。”<sup>35</sup>

这里所说的东方三王，在忽必烈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确实堪称“举兵以来的”最大的支持势力。<sup>36</sup> 乃颜的叛乱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不久之后，“诸王哈丹继续在东北亚全境开展反抗活动，甚至进入朝鲜半岛。哈丹之乱持续了5年之久，直至元29年才被平定。两年之后，忽必烈去世。成宗铁穆耳（忽必烈之孙）继位之后，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远征日本的计划，但是由于海都兴兵反叛，因而无暇顾及。”<sup>37</sup> 从忽必烈继承蒙古帝国的宗主权之日起，这个海都就心怀不满，在中亚细亚地区与忽必烈分庭抗礼长达40年。<sup>38</sup>

#### IV关于“与亚洲的联动”问题

笔者将通过解读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通向蒙古海上帝国之路》<sup>39</sup> 一书中相关论述，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杉山正明认为：“第三次远征日本的计划之所以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一般都会列举出诸如江南各地的叛乱、越南的‘抵抗’活动等等理由。然而，在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时候，却仍然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联想也缺乏说服力。”<sup>40</sup> 杉山正明进而解释道：“从南宋时代开始，江南山区的叛乱和暴动一直是此起彼伏。无论是在远征日本前后时期，还是在远征日本的过程中，这种反叛和暴动都一如既往地持续不断，并不是因为远征日本才爆发叛乱的。另外，有个名叫刘国杰的曾经随军参加过远征日本的中级军官，他就确实率领不满2000人的‘征东兵’去平定内陆地区的叛乱，然而却不能将这一事件看成是中止远征的理由。”<sup>41</sup> 他接着写道：“越南的‘反抗’也与远征日本计划的中止几乎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不同部门的工作和任务。”<sup>42</sup>

不仅如此，杉山正明还认为：“一般说来，由于酷暑、疫情以及当地民众的‘反抗’，忽必烈政权对东南亚的‘海外派兵’与远征日本的结局一样，最后都归于‘失败’。然而，这些远征是否都以实现对当地的军事征服和永久统治为目的的呢？对此不可一概而论，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sup>43</sup> “如果将

它们说成是‘强大的蒙古军队侵略东南亚’，确实也会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如果从‘进攻了’的蒙古方面来看，那就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并不是在充分地研究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类似于从固有印象出发推导出来的概念。”<sup>44</sup>

越南等地民众的抵抗阻止了蒙古侵略日本计划的实施—这种观点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旗田巍所著《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状况》<sup>45</sup> 一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如矢代和也所评价的那样：“在最近几年间日本人民的斗争中，旗田氏这本书可以说是显示出了日本历史研究者终于能够到达的一个节点。”<sup>46</sup> 这种评价已成为当今学界的共识。

此外，关于“侵犯萨哈林的元寇”问题，片仓穰在其前引论文中写道：“从沿海州屡屡发兵对萨哈林的侵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阿伊努民族的顽强抵抗。对当地的阿伊努民族而言，这或许也是一场受益于北方通商活动的民族发挥了自身活力的战争。”<sup>47</sup>

然而，片仓穰此文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承袭了榎森进的研究思路，也将元朝进攻萨哈林看成是与元寇相关的军事行动。中村和之在重新审视了榎森进的观点之后指出道：“将元朝进攻萨哈林视为其企图从北方进攻日本的一个步骤，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元朝进攻萨哈林，是为了讨伐对其控制女直、水达达和吉列迷等地区构成威胁的阿伊努，具有浓厚的防御性色彩，因而不能被说成是元军企图进攻北海道以南地区。”<sup>48</sup> 尽管这种实证式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海津一郎等人在叙述这一段内容时却依然坚持原来的观点。

由此可见，要想在世界历史中、或者在“与亚洲的联动”中来把握蒙古来袭问题，是多么的困难。这不得不让人再次体会到历史研究的艰难：立论不能想当然，必须立足于史料。

#### (3)神风来过吗？

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期间所刮的“神风”是神国思想的象征，应该属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笔者

在此仅仅介绍一下关于叙述这种“神风”的基本情况。

剧作家早坂晓在《国难—蒙古来也》一文中使用了“竟然有两次”、“正面遭遇台风”等含有低级错误的词句，<sup>49</sup>说明时至今日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这也是笔者决定要理清这段史实的理由之一。具体而言，弘安之役的最终结局确实与台风有关，问题是文永之役期间是否有过暴风雨？

根据流行的说法，蒙古军队是因为遭遇暴风雨而败退的，其主要依据来源于朝鲜史书《东国通鉴》。然而，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早在1958年就发表了题为《并非台风宣告了文永之役的结束》<sup>50</sup>的论文，认为：1274年10月20日（根据现行公历应为11月26日）已经不属于台风季节，而且在值得信赖的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此时出现暴风雨的记载，因而文永之役期间的暴风雨可能只是与弘安之役混为一谈的结果。最后，荒川秀俊认定：蒙古军队的撤退是预定作战计划中的行动。

荒川秀俊的这一观点出台以后，即刻爆发了一场“神风”大论战。“不，遭遇过神风”一最初招来的就是这样的反对声。继而成为论战焦点的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遭遇台风？”川添昭二在其《日莲—其思想、行为与蒙古来袭—》<sup>51</sup>一书中，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史料，论证了蒙古军队于1274年10月20日至11月回撤合浦期间确实遭遇过“神风”。关于遭遇台风的具体时间问题，学界存在着3种说法，即10月20日夜晩、10月20日至蒙古军队撤回合浦过程中的某一时刻，10月20日至蒙古军队撤回合浦的过程中。在这3种说法中，“10月20日夜晩”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川添昭二同样也持这种观点。<sup>52</sup>有鉴于此，《岩波日本史辞典》采取了如下模糊的表述：“元军方面主动撤退，在归途中遭受到暴风雨的袭击。”与此同时，海津一郎虽然坚持认为“是夜撤回船上的元军，于半夜遭遇暴风雨”（如前述），然而小林一岳的表述却更为谨慎：“按照传统的说法，前一天夜里暴风雨，即所谓‘神风’

来过，从而使得蒙古的兵船沉没。然而，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征军因内部分裂和遭到日本军队出乎意料的坚强抵抗而决定撤退，或许在归途中遭遇强风暴。”<sup>53</sup>

川添昭二曾将黑田俊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归纳如下：“神国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反动思想意识的王牌，并最终被明治时代的国家神道和帝国主义战争所利用。”因此可见，这个问题也可以作为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课题。

## 二、授课实践中的事例

在前一章中，我们介绍了有关“蒙古来袭”的见解，本章将要考察此项内容在自二战之前以来的日本学校历史课程中的具体表现。

### 1、二战之前

在有关这个时期的授课实践记录中，井上江章的《当前时局之下的元寇教材观》<sup>54</sup>最具代表性，将成为我们的参考资料。

这是一部仅有两页篇幅的短篇教材，其卷首明确地写有这部教材的名称—《寻常小学国史第二十一 北条时宗》，说明它是一部小学教材。它首先写道：“这4个世纪里，‘白人的优越感’于不知不觉之间在亚洲民族的头脑中逐渐形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日本之外的亚洲民族都是白人的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显示了7个世纪之前亚洲民族胜过白人的史实是多么鼓舞人心啊”。

接着又写道：“7个世纪之前的日本能够挫败自诩天下无敌的元朝大军，这在令我们感到痛快无比的同时，也是神国日本的无上自豪，当时只有日本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强者。”然后又明确地主张说：“要意识到：古代日本就是今天的日本”，“松冈全权代表在国联大会上的表现，正是向全世界显示日本的刚强，是作为有色人种的日本人以亚洲人种的气魄和日本精神压倒白人的行为。”

关于坊间广为流传的“神风”，它写道：这“不

是科学的自然现象，我们站在国民的使命——《国民志操涵养》的立场上，这不能不说是神风”。进而解释道：“因为这是实行神道的国家所特有的，所以不是无为的天佑，而是国民上下一致的爱国热诚感动神明的结果。”

最后在“附记”中还写道：“神风以来，星转斗移又650余载，正当支那事变多事之秋，曾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的子孙出动内蒙军、与皇军共同进军惩罚支那，这也确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命运安排。”

由以上所引可知，这部教材的表述言论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只求揭示这种历史事实。

## 2、二战之后

笔者在前引论文A中所引用的教学实例，都出自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所编写的《学习前近代史的新方法——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的对华一》。<sup>55</sup>其中收录了一篇鬼头明成的《中世纪国家与东亚——关于学习‘元寇’的课题》<sup>56</sup>一文，并附有关周一所写的评语。

鬼头明成在整理《历史地理教育》杂志历年所登载的实践报告的基础上，以学生对“元寇”的认知和课堂教学的方式为设问对象，对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考察。鬼头明成的结论可以大致归纳如下：从1957年起，《历史地理教育》杂志开始登载有关学习“元寇”问题的讨论文章，并倡导将“元寇”改称为“元进攻”（即“元军进犯”之意——译者按）；试图从亚洲的视野下来把握“元寇”问题的做法，始于1966年的藤野达善报告和1974年的山形洋报告，而它们又都是从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状况》一书中得到了启示，后来1986年的周藤新太郎报告又将这一视野扩大到了朝鲜和越南；1994年的北尾悟报告设定了一个包括被视为元军败退主要原因的“暴风雨”在内的、题为“小国日本何以战胜大国元朝”的课题，并假设若干题目进行学习讨论，只是传统的“元寇”认识中的歪曲成分（譬如“元=恶”这样的思维习惯）并没有得到纠正。鉴于“元进攻”这样的认识仍然

根深蒂固，鬼头明成提倡对此进行重新认识。

另一方面，关周一则认为：从中国历史和朝鲜历史的大背景下来把握元寇问题的这种做法，早在池内宏的《元寇新研究》<sup>57</sup>一书中就已经出现，只是对于元朝和高丽的“征伐史观”遮蔽了人们的视野。在关于“亚洲的视野”这一问题上，关周一列举了以下研究新动向：村井章介继旗田巍之后将元寇定位于“亚洲的元寇”，片仓穰致力于对各地的抵抗方式和人们的意识的考察，榎森进和中村和之二人正在致力于探讨阿伊努民族在元寇进犯东北亚时的对应状况。

除此之外，鬼头明成还在课堂上让学生读《蒙古国牒状》（即所谓“蒙古国书”），设定思考题——“幕府和朝廷无视蒙古国书的态度是否可取”，引导学生结合当时的亚洲局势思考日本的处境。

针对鬼头明成的这种做法，关周一则认为：这样的设问孕含着一种导致“根据历史事实的善恶进行价值判断”的危险性，与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解读书“蒙古国书”，倒不如引导学生关注当时亚洲的国际秩序。

最后，鬼头明成引用了片仓穰的以下观点：“在所谓‘鞑靼的和平’这一认识中，没有充分地体现出不屈不挠的东亚和东南亚各民族面对侵略和奴役时所展开的抵抗运动及其斗争精神，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蒙古的膨胀给这些地区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悲剧及其留给后世的后遗症。”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如此，后遗症可能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方面吧”。另外，片仓穰曾将“元寇观”的问题归结为“蒙古夷狄观”和“对游牧民族的偏见的再生产”，鬼头明成对此批判地指出道：“依靠‘侵略和抵抗’这一模式的元寇观，是无法克服（这种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关周一并没有直接作出相关反应。

### 3、最新的实践报告

真正堪称为“最新”的报告有如下两篇。

(1)岩本贤治的《接下来将会怎样？—由蒙古来袭进行推论》<sup>58</sup>

岩本贤治的这篇报告首先从“中学生与历史认识”开始切入。作者根据人能够“在生活中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这一特点，认为人也“能够克服本国中心主义的认识”，从而确立了如下原则：“中学生的历史学习，必须要指导学生具备上述意识，正如视野要从亚洲扩展到全世界那样，要能够多视角、多层面地把握和认识历史事实。”为此，就要采取下列学习方法：“设定多种立场（视角），以年级为单位，从各种不同的立场出发，互相提出见解、互相批判、互相补充，在双方意见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见解，学会追求真理、并形成自己的独特认识。”

其次，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破解奥秘的快乐”，岩本贤治从以下3个方面对高丽的三别抄送给日本的信函进行破解奥秘式的解读：这封信函写了什么内容？日本方面做了怎样的回复？日本和三别抄并肩作战了吗？作为具体实施过程，可以归结为4个步骤，其中前3步为：①“导入：扩展到欧洲的蒙古帝国”，②“展开之一：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军团立现眼前”，③“展开之二：来自三别抄信函”。具体而言，在“导入”部分，出示图片“拔都征西军进攻里格尼茨城堡”，让学生在空白的蒙古帝国疆域地图上找出该战役的位置，并涂上颜色；在“展开之一”部分，出示图片“蒙古袭来绘词”和“八幡愚童训”，让学生明确日本战法和蒙古战法的不同之处；在“展开之二”部分，让学生以班为单位，结合上述破解三别抄信函奥秘的3个方面，实际体验“破解奥秘”的过程，目的就在于“通过让学生转换视角、尝试着站在朝鲜三别抄的立场上写信、使他们切身感受历史，然后让他们在预测‘接下来将会怎样？’的过程中尝试‘推论’，再结合历史事实进行‘验证’，从而体验历史学习的快乐。”

最后在④“展开之三：结论—东亚的‘元寇’”

部分，岩本贤治以Y同学的感想作为报告的结语：“蒙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人的法则。他们杀人、掠夺别人的土地、盗窃并破坏东西等等，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最后才变成了这样糟糕的结果。”

(2)三桥广夫的《中学生及其学习‘蒙古来袭’的课堂教学》<sup>59</sup>

三桥广夫的这篇报告共分为6个部分。

在“①教学的课题”部分，作者明确指出：过去的课堂教学是“以教师所教为优先的教学”，是令人不满的课堂教学，本次课堂教学就是要克服以往的不足，努力成为“符合孩子们认识水平的课堂教学”的一次实践。

在“②首先从孩子们的疑问开始”部分，先介绍了教材中的一段表述内容：“1274年，（蒙古军队）经由对马和壹岐在北九州的博多湾登陆，依仗密集型集团阵战法和先进的火器使日本军队吃了苦头之后，撤回原地（文永之役）”，然后与资料集中所谓“（蒙古军队）因暴风雨而败退”的记载进行对比，让学生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

在“③日本是否应该与元朝作战”部分，以“元朝要求日本臣服的信函”为史料，让学生进行讨论。紧接着，在“④关注日本与元朝的关系”部分，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据说即使在这场战争中，日本的船只也频繁地出驶元朝。这让孩子们惊奇不已。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船只不仅仅是出驶战争敌对国家，甚至还与对方进行贸易活动，所以这就超出了孩子们的思维范围”，制作出重新思考日元关系的相关史料，让孩子们展开讨论。顺便提一句，在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的中学社会科教材《中学社会—关注历史与未来》<sup>60</sup>中，也增添了下列内容：“之后，元朝也曾经计划再次进犯，但是由于中国和越南的叛乱而未能实现。另一方面，元朝与日本的民间贸易得以频繁地展开。”

在“⑤听千叶大学附中初三学生的报告”部分，让孩子们听千叶大学附中中学生关于“一遍上人绘传”



的报告。该报告分为两个主题，一是“一遍上人的教义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二是“一遍上人是怎样传播教义的？”在孩子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三桥广夫提了一个启发性的问题：“战争期间，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于是就引出了一个学生的回答：“不管是武士还是农民，日本人肯定会抱成一团跟元朝作战的。”三桥广夫集中了与此相关的各种意见之后总结道：“如果考虑性命或者损失的话，谁都不想战争，但是为了抵抗元朝的侵略，那就不得不起来战斗。”此外，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必须将幕府及其贵族与农民等区别开来。”

在“⑥总结”部分，三桥广夫首先介绍了上课一开始的时候大辅同学的一句话：“日本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应该明确告诉忽必烈，日本不愿意向他臣服，然后跟元朝战斗。”然后对此评价道：“这种‘日本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的说法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违背常识的；这反应出一个事实：对孩子们来说，历史是一个与自己相聚遥远的世界。”

接着，三桥广夫介绍了直人同学针对朝贡问题提出的看法，肯定了这是一种从与大辅同学“不同的视角解读忽必烈国书”的方法，进而评价道：“直人同学这样想问题，将第二次战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并认为‘由于在承久之乱中经历过战争，知道战争会带来很多损失，因而日本并不愿意战争’，这样一来就将自己的认识扩展到了承久之乱。”

最后，敦子同学说出了自己看法——“战争会给双方的国民带来损害，应该进行谈判”，并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解读忽必烈的国书，从而使得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化：“我讨厌元朝。一想到这里，就觉得刚才的忽必烈信函也就像谎言一样。”三桥广夫评价道：“走近历史的敦子同学在不知不觉中表达了存在于自己认识之中的国家意识。”

在对大量实例（还有一些实例本文不再一一列举）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三桥广夫最后总结道：“我们在课堂教学的时候兼顾到孩子们固有的‘国家理

论’，这并不是为了将它置换成其他的什么理论，而是为了让孩子们觉察到这一点、并对这种做法的有效性进行自我反省。”另外，由于本次课堂教学中没有出现涉及高丽和越南的提问，因而三桥广夫认为：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当孩子们关注历史的时候，不能把眼光仅限于一个日本，而是要放眼全世界——这才是社会所需要的历史教育。”

以上仅仅是对最新的课堂教学实践的介绍，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这次不能进行更进一步的评判，再次对岩本贤治和三桥广夫二位老师精心设计和实施的教学实践表示敬意。之所以要感谢他们二位，因为一贯倡导主导型人物学习的安达弘，在解读了与谢野晶子的两首诗作之后，向孩子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老师希望像与谢野晶子那样，怀着两种心情看待战争。一种是严酷的心情，认为战争之中也有避免不了的战争；另一种是温和的心情，认为战争会死很多人，因而要尽量避免战争、不进行战争。战争并不是或者‘反对’、或者‘赞成’那么单纯的问题。希望大家都能以这样的两种心情来思考战争。”<sup>61</sup>难道只有笔者一人从中感到了某种危险吗？

### 三、关于教材表述的分析

在本章中，笔者仅对前一章所介绍的教学实践中使用的教材中的表述进行分析，不涉及学校制度和教科书制度。<sup>62</sup>

#### 1、二战之前

笔者在前引论文B中，曾对这一时期小学所用历史教材中的表述做过整理，本节将以此为基础做进一步展开。所选的分析对象，都是明治时代以来不同时期出版发行的、比较具有时代特征的教材。

分析的内容包括以下8个方面：①题目、②关于蒙古国书、③关于文永之役始末、④关于蒙古军队的战术与幕府的对策、⑤关于弘安之役始末、⑥关于第3次远征日本、⑦关于其他特别事项、⑧意

义。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在对各个项目展开分析时将只标示序列号。另外，凡是标有双引号的文字部分都是教材原文，其余部分则是笔者的分析。

(1)《史略》(明治5年、即1872年，文部省刊)

- ①—“人皇(第九十一代龟山天皇、第九十二代后宇多天皇)”
- ②—无表述
- ③—“击退”
- ④—无表述
- ⑤—“时，大风起，虏舰倾覆。称之为弘安之役。”
- ⑥—无表述
- ⑦—无表述
- ⑧—无表述

(2)《小学校用日本历史》(明治26年、即1893年，金港堂刊，明治27年文部省审定通过)

- ①—“第十八章。元寇。北条时宗”
- ②—“其书面无礼，镰仓之北条执权相模守平时宗断然却其使”
- ③—“遣兵乱闯我对马、壹岐及筑前，”
- ④—“敌之军舰强大于吾船，进退极为自在，配备有石弓等飞掷器具，……”
- ⑤—“弘安四年，即纪元千九百四十一年”/“水陆之战昼夜不断、极为惨烈”/河野道有的奋战/“总大将范文虎辟易吾兵之骁勇，已然将欲遁去之时，骤然风疾浪涌，……”
- ⑥—“忽必烈也竟然由此而放弃日本，吾国武勇之名长存于彼等记忆之中”
- ⑦—“遭此大难，时宗毫无慌乱之举，或尽诛夷敌，或举国皆死，决心二者取一”
- ⑧—“如是，外国来攻吾国之例古来甚少，虽偶有此例，无步彼后尘者。万一有让一步国土于外国之事，此国将亡于他国，……”/“故，一旦有遭遇外国攻击之事，国民应奋起尽全力防御之”/“以此为征

兵之首要理由，亦即守卫国之太平之权宜也”

(3)《小学日本历史》(第1期国定历史教科书，明治36年、即1903年，文部省刊)

- ①—“第十九 元寇”
- ②—无表述
- ③—无表述
- ④—无表述
- ⑤—弘安四年/“大破元兵”/“恰巧，大风，骤起，……”
- ⑥—“元不再觊觎我国”
- ⑦—“龟山上皇，大喜，亲自祈祷不复遭遇国难，……”
- ⑧—无表述

(4)《普通小学国史》(第3期国定历史教科书，大正9年，即1920年，文部省刊)

- ①—“第二十一 北条时宗”
- ②—“蒙古王已使高丽臣服，进而蔑视我国为小国，亦欲使我臣服，命高丽王送来无礼书信”
- ③—“文永之役”/“文永十一年”/“……于博多附近登陆，我将士勇敢御之，遂使敌军逃去。世谓之曰文永之役”
- ④—“于博多湾之海岸筑石垒”
- ⑤—“弘安之役”/弘安四年/菊池武房、河野道有之奋战/“其后，来自支那大军与其相遇，正进逼之时，大风骤起，……”/“世谓之曰弘安之役”
- ⑥—“自此之后，元不复觊觎我国”
- ⑦—“时宗者时赖之子也。世称相模太郎。生来有豪气，善弓箭。曾召将军武人射弓之时，人皆恐射偏而踌躇不发，年仅十一岁时宗毫无惧色，单骑出列、一射中的，载誉而归”/“龟山上皇甚忧之，亲赴伊势神宫祈祷，欲以身代受国难”/“近来，明治天皇追赏时宗之大功，特赠从一位”

⑧—“上下一致驱逐元寇”/“此二役，实为我国最初之大难，……”

(5)《小学国史 普通科使用》(第5期国定历史教科书，昭和15年，即1940年，文部省刊)

①—“第二十一 北条时宗”

②—“时宗见其书信之无礼状，大怒，立逐来使”

③—“文永之役”/文永十一年/“我将士毫不胆怯，死战死防，元军终于逃去。世人称之为文永之役”

④—“于博多湾之海岸筑石垒以御敌军，并制定进一步攻入敌阵之计划”

⑤—“弘安之役”/纪元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弘安四年/菊池武房、河野道有、竹崎季长之奋战/“神风骤起，……”/“世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⑥—无表述

⑦—“时宗，十一岁时因善射而获誉”/龟山上皇之祈祷/明治天皇追赠时宗从一位

⑧—“上下一心驱逐元寇”/“天照大神之佑助，上下一心，故能长期抵御如此强敌、并最终将其驱逐，国土得以守护”

在明治初年的教材(1)中，没有提及有关蒙古国书的无礼问题，关于文永之役始末的表述也极为简略。教材(2)刊行于中日甲午战争(1894~95年，即明治27~28年)的前一年，因而将蒙古蔑称为“夷敌”，并强调了征兵的必要性。然而，该教材并没有将文永之役的结果归结于暴风雨。教材(3)是第1期国定教科书，却与此前的教材风格迥异，对文永之役和抵御蒙古来袭的意义没有任何表述，文字简单明了。教材(4)刊行于大正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教材增加了北条时宗少年时代的逸闻趣事，这是为了让孩子们对他抱有亲近感和尊敬之心。编者试图通过国史教材进行国民教育的意图，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从明治44年的第2期国定教科书改订版开始，

“上下一致”之类的表述成为常态。这是在日俄战争(1904~05年，即明治37~38年)以后出现的事情。

教材(5)刊行于1931年(昭和6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昭和12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进一步攻入敌阵之计划”之类的表述始于明治42年的第2期国定教科书，“神风”一词首次出现于昭和9年的第4期国定教科书。历史教材通过蒙古来袭这一历史事件究竟应该向皇国少年进行什么教育，在这里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是日本在中途岛海战的大败(1942年)和从瓜岛的大撤退(1943年)，刊行于这段时期的国定历史教科书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6)《初等科国史》(第6期国定教科书，昭和18年，即1943年，文部省刊)

①—“第五 镰仓武士”“三 神风”

②—“其文过于无礼，朝廷不予回复。”

③—文永十一年(纪元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宗助国之战死/“在这场奋战的同时，博多海面风浪始起。不知是担心海上的船只，还是害怕我军的夜袭，敌军船只撤回了原地。进入夜晚之后，风刮得越来越大，敌船接二连三被掀翻。……”/“世人称之为文永之役”

④—“因敌人先进的兵器和变化的战法而困惑，”/“元朝即使为了国家的面子，也打算再次远征日本，已经命令早就厌倦了的高丽建造船只，”/在博多湾一带筑建石垒/“整备军船，甚至制定了深入敌阵的攻击方案。国民得知这一消息，立刻热血沸腾。肥后有一位名叫井芹秀重的老人和一位名叫真阿的老太婆也执意报国，甚至不顾自身的行动不便，将自己生死相依的儿孙奉献了出来”

⑤—“纪元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弘安四年”/河野道有、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的奋战/“敌舰挤满了博多湾。大日本是神国。”

又一次狂风吹来，翻滚的浪涛冲得敌舰上下狂颠、首尾相残、纷纷沉没。我军将士勇气百倍地袭击残敌，迅速将其赶尽杀绝。全歼敌舰的消息飞快地从太宰府传到京都、传到镰仓，胜利的喜悦像水中波纹一般，传遍了全国各地。世人称之为弘安之役，并与文永之役一起称为元寇”

⑥—“虽然元朝此后又策划过第3次出兵，但是由于害怕我国的威势，再加上出乎意料的内讧，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⑦—“日本武士之魂果然允许他们的进攻吗”／“命令一般国民为积攒军费而厉行节约”／“龟山天皇在皇大神宫祈愿以身替代国难。所有的神社、所有的寺院，到处都挤满了真心报国的国民”

⑧—“敌人是号称世界最强大的元朝，因而就我国而言，这可是一场不曾经历过的大国难”／“想来，元寇是我建国以来最大的国难，是一场前后达30余年的长期战争。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度过如此大难，完全都因为我们是神国的缘故”／“武士的勇武成功地挫败了强敌，草民也应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国家而积极工作。另外，国难当头，举国一致，最终度过了难关，这完全都归功于皇天祖灵，同时这种举国一致的体制也巧妙地体现了神的护佑。”（以下省略）

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这部教材首次以“神风”为标题，并在此关联之下、将文永之役的结果归结为暴风雨。总体而言，该教材的特征就在于它认真地扩充了教材(5)表述的篇幅，譬如老人将自己生死相依的子孙奉献给国家的具体实例、以及采取了诸如“日本武士之魂果然允许他们的进攻吗”等表述方式。

## 2、二战之后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以二战之后第1部历史教

材—《国家的历程》、争议颇多的扶桑社、最新的初中历史教材、以及最新的高中日本史教材（日本高中的历史教材分为“日本史”和“世界史”两部分）各一部（共4部），另外再加上2部高中“世界史”教材为分析对象。

另外，原本应该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改订和检定，只是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因而只做介绍。

(7)《国家的历程》（第7期国定教科书，昭和21年，即1946年，文部省刊）

①—“第四 武家政治”“一 镰仓幕府”“蒙古来袭”

②—“因该书信无礼而不予回复”

③—文永十一年（西历一二七四年）／“由于敌军登陆，因而举行了遭遇大难的仪式。然而，大风骤起，将敌军船舰倾覆，得以退敌”

④—无表述

⑤—弘安四年（西历一二八一年）／“此时又是大风暴的到来，刮走了敌船”

⑥—无表述

⑦—无表述

⑧—无表述

(8)《中学社会 新编 新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平成21年（2009年）4月3日文部科学省检定完毕）

①—“第2章 日本中世纪的历史～镰仓・室町时代～”“第1节 武家政治的发端”“22 元朝来袭以及其后的镰仓幕府”

②—“忽必烈企图扩大其对东亚的统治、征服保持着独立的日本。忽必烈先是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要求对其臣服。然而，朝廷和镰仓幕府态度一致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③—“元军两次都因遭遇后来被称为‘神风’的暴风雨的袭击而败退”

④—“日本方面遭受掠夺和残虐暴行的侵害，同时也因元军的新式武器而苦恼。然而，镰仓武士面对这场国难，勇敢战斗”／在

“历史上的那一天 蒙古来袭”这一栏中，插入了《蒙古袭来绘词》，解说词长达半页之多，其中写道：“元军的战法是：击鼓敲锣、用带毒的箭簇和火器发动进攻”、“在博多湾沿岸构筑石垒等”。

⑤—同上述②所记。／在“历史上的那一天”一栏中写道：“日本方面乘着夜色登上敌船，斩杀众多敌兵、点燃敌船后撤离。此时，暴风雨再次袭来，元军遭受巨大损失后逃走”

⑥—无表述

⑦—关于“日本取胜的一大原因”，在“历史上的那一天”栏目中有解说。

⑧—在教材正文中出现“国难”、“神风”等词语。／“这样一来，日本才保住了独立”

(9)《社会科 中学生的历史 日本的历程与世界的动向》(初订版)(帝国书院，平成17年(2005年)3月30日文部科学省检定完毕)

①—“第3章 武家政治与东亚”“1节 武士天下的发端”“3 渡海而来的元军”

②—“忽必烈向日本派遣使者、要求日本向自己朝贡和臣服，此事发生在忽必烈征服高丽之后的1268年”／“元朝要求臣服的书信”(花边栏附录)

③—“1274(文永11)年，元军涌至九州北部，并在博多湾登陆。(中略)又有暴风雨，元军立即撤退(文永之役)”

④—“被元军的集团阵战法和先进火器所压制”／“防护垒”(附有照片和说明)

⑤—“1281(弘安4)年，元朝大军再次袭击九州北部。元军由于幕府军队的抵抗和岸边防护垒的阻碍而无法登陆，又遭受了激烈的暴风雨的打击，于是撤退(弘安之役)”

⑥—无表述

⑦—“这两次元军侵袭事件被称为元寇”／“地域史 袭击北方与南方的另外两次元寇”

(花边栏附录)

⑧—“元寇给日本人带来了强烈的恐怖感。另一方面，在那些认为暴风雨是日本诸神所为的日本人中间，视日本为‘神国’、鄙视作为元军一部参与交战的高丽(朝鲜)的思想也逐渐得以强化”

(10)《详说 日本史 改订版》(山川出版社，2006年3月20日文部科学省检定完毕)

①—“第4章 中世纪社会的形成”“4 蒙古袭来与幕府的衰退”

②—“使高丽彻底臣服，屡次要求日本朝贡”

③—“遇到了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于是退去”

④—“面对元军的集团阵战法和先进的兵器”／“强化了让御家人负责警戒博多湾等九州北部要塞的轮岗警戒制度，同时又下令在博多湾沿岸构筑石头防护垒”

⑤—“1281(弘安4)年，约14万大军进犯九州北部。然而，正当他们在博多湾沿岸登陆受阻的时候，暴风雨降临，使其遭受巨大损失，再次败退”

⑥—“元朝因为后来还计划过征服日本，”

⑦—“这两次元军袭来被称为蒙古袭来(元寇)”／高丽、原南宋势力以及越南等地区人们的抵抗，也成为元朝放弃第3次侵略计划的重要原因。

⑧—“从朝廷获得了动员包括御家人在内的、全国庄园和公有领地上的武士的权力，同时还以蒙古袭来为契机，加强了幕府在西部一带的势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高中世界史教材中的相关内容。其中的表述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将日本历史上的事例放在世界历史之中进行相对化定位的历史意识。

譬如：在《世界史B》<sup>63</sup>的第11章—“欧亚大陆诸帝国的荣光”和第13章—“中华帝国与亚洲”这

两章中就有相关的表述。

在第11章开篇的“概要”中有下列表述：“曾经分裂为金和南宋的中国在蒙古的旗帜下统一之后，中国展示出其作为巨大市场的形象。虽然帝国进攻日本和爪哇遭到了失败，但是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却积极地谋求与蒙古的贸易，因而海上贸易得以发展，迎来了海洋时代”。在第1节—“蒙古帝国”的“蒙古帝国时代的東西交流”项目中，既附有《横跨东西世界的蒙古帝国》地图，也在“蒙古军队远征路线图”中标示了对日本的侵犯。教材正文记述道：“根据伊斯兰天文学的知识，中国的郭守敬创制了授时历”。另外，还在正文之外的花边栏附录中论述了授时历与日本贞享历的关系。

在第13章的“概要”中则有如下表述：“1279年，忽必烈最终灭掉了南宋，并借此势头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日本、缅甸和爪哇。在东亚的核心地区建立起来的元朝（大元朝廷），实际上获得了管辖成吉思汗分封地（诸汗国）的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地位，控制着陆路和海路，与西方世界相对峙。”在第1节—“元朝的建立”的“元朝与东亚”项目中涉及到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忽必烈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高丽之后，将目光转向了日本。1274年，通过征调高丽民夫而组成的蒙古和高丽的联军进犯九州北部（文永之役）。在南宋灭亡之后的1281年，动员南宋民夫，再一次远征日本（弘安之役）。然而，由于镰仓政权统辖的武士团的抵抗和碰巧降临的台风的袭击，这种被称作元寇的侵略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虽然着手准备了第3次远征日本，但是江南各地频频发生反抗运动，作为附属国的越南北部的大越国（陈朝）和南部的占婆也开始举行反抗。元朝派遣大军前往越南镇压，陈朝的抵抗尤为顽强，曾3次击溃元军的进攻。元军在越南遭到失败之后，忽必烈转而进攻已显露出反抗意向的爪哇（信河沙里王国），但是元军在这里又遭到失败”，“就这样，以元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新组合最终并未实现。然而，正如元朝、日本与高丽之间的贸易船舶

使在交战期间都没有停止往来那样，东亚贸易圈却得以持续。（下略）”

在学界颇受好评的《详说世界史 改订版》<sup>64</sup>，只在其第4章—“亚洲内陆世界的变迁”的第3节—“蒙古民族的发展”的“元朝的东亚统治”项目中，对有关内容做了如下表述：“忽必烈除了领有蒙古高原和中国之外，还使西藏和高丽成为附属国。进而他又进军南方，向日本、越南、缅甸和爪哇派遣远征军。虽然远征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未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是元朝的南进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动。（下略）”另外，在“蒙古时代的欧亚大陆”项目中，涉及到了日本接受授时历的过程及其与贞享历的关系问题。

如上所述，东京书籍版教材与山川版教材之间的差异可谓一目了然。另外，东京书籍版教材致力于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为蒙古来袭找到其在东亚世界的定位、以及通过“授时历”这一关键词来揭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这种做法确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 四、关于插图和图版的变化

本章的目的在于揭示插图和图版所代表的意义的重要性。<sup>65</sup>

##### 1、二战之前

先就插图做一简略的概述。使用插图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了便于儿童的理解，然而这也不是唯一目的。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一下关于使用插图的具体规定。

1879年（明治12年），天皇的侍补兼侍讲元田永孚亲自编订的《教学圣旨》正式颁布。它的基本理念恰恰符合明治政府所要求的人才形象，其中这样写道：“要求揭示古今之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和写真，在幼年生入校之初，首先展示此画像、教谕其事迹之概略，使其感知忠孝之大义于刻骨铭心”。其后，在1891年（明治24年），《小学校教则大

纲》出台，其中规定：“教授日本历史之际，尽量展示图画，便于儿童想象当时之实情”。换言之，《教学圣旨》明确了这种做法的意图，《小学校教则大纲》则将其制度化。

关于本文前一章中所列举的教材中的插图说明，有些在笔者前列论文C中已有所涉及。在本章中，笔者将对应前一章所列教材的顺序，以其插图内容为标题进行具体说明。

#### (1) — “伐元寇”

该教材根本未曾涉及蒙古国书内容方面的无礼或不逊，对文永之役的经过也只是做了简略的表述。然而，在插图上却突出地表现了竹崎季长一边向安达盛宗献上两颗敌军首级、一边汇报战况的场面。这是从《蒙古袭来绘词》（下卷四十纸）上截取下来的一个画面，虽说是明治初年的印刷品，但是图案仍然鲜艳。

#### (2) — “蒙古军之大败”

该教材的目录中已包括插图，我们在此也沿用其原来的标题。原文中没有插图说明，只写道：“会会西风大起，海水簸荡，贼舰破碎”。

这使我们想到《高等小学历史》<sup>66</sup>中的插图，图案与此有相似之处，而且还附有说明文字：“贼舰遇飓风覆没图”。这是矢田一啸的全景画完成之前的作品。<sup>67</sup>

#### (3)、(4) — “元寇”

“国定教科书”的第1期至第5期（包括第2期改订版）都使用了这幅插图。取自《蒙古袭来绘词》下卷二十六纸的舰船占据了中央部位，正前方的小船是模仿其下卷十九纸的样式，作为背景的舰船则取自其下卷二十八纸。另外，在正中央的舰船的尾部，有竹崎季长摘取敌军首级的场面，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对手并没有武装。

#### (5) - i — “我军勇士奋战图”

画面与上列“元寇”相同，只是解说词不同。在该教材的卷首刊有“神敕”，很明显，这是为了适应1937年（昭和12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时局变化的

需要而加上去的。

#### (5) - ii — “元兵来寇之图”（地图）

这张地图从第3期“国定教科书”开始使用。这一期教材选取了北条时宗少年时代的逸闻趣事，就是为了有利于让儿童对其产生亲近感和崇敬之心。由此看来，向学生展示地图，也是为了在教学过程中让儿童更加容易地理解蒙古来袭这一事件。

具体而言，通过北条时宗的趣闻故事，对儿童实行国民教育和训导，并在此基础上让儿童进一步了解日本和元朝在“东亚”的地理位置关系。

#### (5) - iii — “博多湾的石垒”

这幅插图是该教材首次使用。这部第5期“国定教科书”刊行于1940年（昭和15年），其中有关蒙古来袭的全部表述，可谓集迄今为止皇国少年教育之大成。

石垒在这里出现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知道这种石垒是怎样建造起来的。该教材写道：“在博多湾海岸上筑石垒以防备敌军，同时还做好了攻入敌阵的准备。”其口吻恰好与时局相一致。这幅插图选自史迹现地讲演会所编《元寇史迹新研究》中的一幅题为“发掘完毕的元寇防护垒一部”（大正而年七月二十日）的照片。<sup>68</sup>

#### (6) - i — “元朝国势”（地图）

在世界地图上，当时的局势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从《校正日本小史》<sup>69</sup>开始一直坚持通过地图加以说明。其中这样写道：“此时蒙古尽占亚细亚之中西部，并有欧罗巴之东部，又降支那高丽，其疆土兵势之强大，世界无比”。到了这一时期，作为历史地图、也作为历史学习的教材，这种做法已经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 (6) - ii — “北条时宗”

这幅北条时宗画像原藏于满愿寺和元寇史料馆。

#### (6) - iii — “元寇”（地图）

蒙古军队的来犯进军图，实际上是在上述(5) - ii (“元兵来寇之图”)的基础上稍微增加了一

些地名而已。然而却只是标示出朝鲜半岛和九州北部，并没有标出弘安之役中江南军的出发地点。

(6)-iv—“老太婆的气概”

这是首次出现的插图。关于该插图所反映的内容前面已经做过说明，是一对老人将自己赖以生存的子孙奉献给国家的故事。在该材的结尾处，这种在国难来临之际“草民也各尽其责”地为国分忧的举动受到了赞扬。这幅插图就是与此相呼应的。

(6)-v—“突然袭击”

这幅插图是以《蒙古袭来绘词》下卷十五纸“草野次郎经永之兵船”为蓝本绘制而成。

用“突然袭击”一词作为插图的标题，也许不太适合出现在教材之中，因为它容易使人联想到偷袭珍珠港。顺便说一句，在该教材中确有“将国家命运系于机翼之上，突然袭击了珍珠港”这种表述。另外，日本国语辞典对“突然袭击”做如下解释：“趁对方不注意突然行动。奇袭。令人震惊。”<sup>70</sup>

(6)-vi—“全歼敌舰”

这幅插图是在参考了矢田一啸的全景图的基础上绘制而成，但是它的线条比矢田一啸的作品更为细腻。教材中关于它的表述如下：“大日本是神国。狂风又一次刮来，翻滚的波涛使得数千艘敌舰不停地剧烈摇晃、纷纷撞碎、以至于沉没”。

## 2、二战之后

教材(7)只是在这一章的末尾处附加了一张“禅宗之寺”的照片，似乎与蒙古来袭没有直接的关联。

教材(8)的这一部分中附有多幅插图：以“13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为题的地图，“忽必烈汗”肖像画，“元军的进军路线”图，作为“历史上的那一天—蒙古来袭”栏目的附图、以“蒙古来袭时与元军作战的御家人”为题的竹崎季长作战场面（取自《蒙古袭来绘词》）。这些插图都附有详细的解说词。此外，还有以“为防御元军登陆而在博多湾沿岸构筑的石垒”为题的照片。

另外，该教材的市场流行本—《新历史教科书改订版》<sup>71</sup> 载有“‘敌国投降’书”，并做如下说明道：

“龟山上皇为祈愿对元军作战胜利而藏于管崎宫之物”。

教材(9)附有插图3幅：①“与元军作战的武士（《蒙古袭来绘词》，藏于东京都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附有作者的肖像画，并有说明如下：“九州的御家人竹崎季长因与元军作战而被恩授地头之职，为表示感谢而特作此画。”②欧亚大陆的地图，并以“蒙古帝国之领域”为题、标示出帝国的疆域、“附属于元朝的国家”以及“蒙古军队的远征路线”。③以“元寇防护垒遗址”为题的照片，并说明道：“为防御元寇，幕府命令御家人在博多湾沿岸构筑了高达3米的石垒。此照片为复原图。”另外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文中①~③序列数字也是从教材中如实照抄下来的。

在关于《蒙古袭来绘词》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对第二三纸和第二四纸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众家选用的对象。“与元军作战的武士”也是这部分。如果配上解说词的话，那就应该是这样的：“左侧为元军，右侧为日本的骑马武士竹崎季长。显示出在被称为‘火药弹’的元军火药的爆炸声中、冒着元军士兵的密集箭簇而奋勇作战的武士形象。（文永之役）”<sup>72</sup>

关于这第二三纸和第二四纸，村井章介在其《北条时宗与蒙古袭来》一书中有如下说明：“两纸的接缝附近所画的3名蒙古兵是后来加上去的”。<sup>73</sup>（请参见末页的图版）

教材(10)的附录插图有4幅：“12~13世纪的东亚”地图、“与元军的陆战图”（取自《蒙古袭来绘卷》）、作为“蒙古袭来相关要图”而标示出来的朝鲜半岛至九州北部地区的地图、“防护垒遗址”的照片。

至于世界史教材的相关情况，我们以前引山川版教材和东京书籍版教材为例稍加说明。在山川版中，作为对应“元朝关系”的插图，即在“蒙古帝国的最大疆域”图中并举了以下4幅：“忽必烈汗时代的远征路线”、“蒙古皇室帝王谱系图”、“忽必烈狩



猎图”和“蒙古时代的通行证”。然而，该教材中并没有附载与蒙古来袭本身有关的插图。

东京书籍版教材在其“欧亚大陆诸帝国的荣光”这一章的“蒙古帝国”一节中，在介绍“横跨东西世界的蒙古帝国”的“蒙古军队的远征路线”时标示出了进犯日本的途径。同时，在其“中华帝国与亚洲”这一章的“元朝的建立”一节中，先后配有“蒙古骑兵”、“元朝的纸钞”、“蒙古帝国的牌符”、“元朝的观星台”和“元寇”（取自《蒙古袭来绘词》）。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上述东京书籍版教材和上述山川版高中日本史教材中所附载的“元寇”和“与元军的陆战图”均为《蒙古袭来绘词》中的著名画面，但在此处教材引用的画面中却舍去了退却中的蒙古士兵这一部分。

## 五、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教科书

### 1、问题所在

关于蒙古民族的历史研究，除了笔者在上文中所介绍的渡部升一和早坂晓的观点之外，井泽元彦所著《悖论的日本史—中世纪神风篇—》<sup>74</sup> 中的观点也值得一提。

井泽元彦认为：“在居住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看来，游牧民族本来就是野蛮人。对这些居无定所、常年迁徙的人们来说，根本无法在他们中间构建一种‘安居文化’模式。”<sup>75</sup> 他的这种观点与片仓穰所指出的“蒙古夷狄观”和“对游牧·狩猎民族偏见的再生产”如出一辙。

大约在10年以前，笔者曾以“高中世界史教材中的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生活文化”为题写过一篇论文。<sup>76</sup> 笔者在文中列举了6家出版社出版的11种高中世界史教材，从“如何理解游牧”和“如何表述游牧民族的生活与文化”这两个层面上，对这些教材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就结果而言，各家教材除了表述上的详略不一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关于游牧的定义及其基本生

活方式的理解上，各家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其次，简单地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进行比较。仅从这一现象上看，人们就有理由对教材撰写者的理解表示质疑。换言之，他们的理解是不得要领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缺乏学习的。

井泽元彦的观点也与此相似。实际上，“蒙古夷狄观”也是建立在对游牧文化缺乏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在此，我们先对“夷狄”一词说上几句。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有中华与四夷之分；汉民族自称为“中华”，将四周的异民族（非汉民族）蔑称为“夷狄”或者“蛮夷”。然而，竹村卓二在该问题上有独自的看法。他认为：从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交往历史来看，“双方之间原本并不存在绝对的差异。如果非要找出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也就是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一种优越意识，至少没有‘人种差异’。”在他看来，古代北方的非汉民族之所以被称为“（北）狄”，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以狩猎和畜牧为主体、与狗和狼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缘故，可见这种称呼来源于该民族的生活状态和习俗的特征。<sup>77</sup>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甚为妥当。

从上述这一立场出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教科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对此，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二人曾经做过相应的探讨。

杉山正明《悖论的欧亚大陆史—从蒙古的视角出发》<sup>78</sup> 的第1章，以“重新审视欧亚大陆史”为标题，从下列两个层面上阐述了自己的新观点：“①十九世纪的负遗产—所谓的‘世界史’科目”、“②游牧文明—另一种世界史”。在其第1节的“地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史形象”这一项目中，作者写道：“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界，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与世界史相关的各研究领域始终都被分为两大块，并被分别冠以日本独有的名称—西洋史和东洋史，呈现出两强共存的局面。然而，如果从建构一种世界史整体形象的要求出发，这种局面却导致在研究水准上的‘国际话语能力’的大逆转。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在东洋史的名义下从事亚洲史研究的学

者们，对世界史极少有发言权；相反，对欧美思潮和动向比较敏感的西洋史学者们则基本上掌握着话语权，以至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形象被‘维持’至今。”<sup>79</sup>

森安孝夫参与了大阪大学的21世纪COE项目——“相互融合的人文学”的研究，并提交了以《丝绸之路与世界史》（大阪大学，2003年）为题的研究报告。在这篇报告中，登载了森安孝夫1篇标题为“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的论文。作者在其中特别指出道：“年鉴学派的领袖——法国的布罗代尔曾指出：伊斯兰世界尽管是欧洲的敌人，却对欧洲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这是继皮雷纳之后对伊斯兰世界所做的相当正确的评价。然而，在通读了他为大学预科的学生所写的世界史教材之后，却发现他对中亚历史的理解实在是不敢恭维。”“首先，在近代以前，世界史的驱动力量是中亚的游牧民族，东西方交流的承担者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最早将世界连成一体、从而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是蒙古，而他对这三者的认识是有失公允的。简而言之，他的认识水平基本上等同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多数初中和高中所使用的教材（帝国书院版教材例外）。由于高中的世界史教材仍然信守着明治维新时期由西欧传入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万国史模式，因而没有一个学生能够仅仅通过‘独自’阅读这种教材来正确了解世界史的（除非教师特别优秀）。”<sup>80</sup>

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二人的上述观点的背后，是他们对欧亚大陆历史的理解。

## 2、笔者的建言

40年以前，笔者曾经拜读过前川贞次郎的《梅尔卡特世界史形象——大大的错觉》<sup>81</sup>一文，犹如醍醐灌顶。作者敏锐地指出：“根据这个制图法，大部分土地位于北纬40度以北的‘欧洲’的面积被扩大到不恰当的程度，而与欧洲面积相差不大的、位于低纬度上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却被显示为相当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面积。它给人们一种错觉，那

就是‘欧洲’是一块大陆，而印度则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半岛。”“根据传统的地理概念，在面积上与印度相差无几的欧洲是一块可以与亚洲以及非洲相匹敌的大陆，而将这种大错觉固定化的，正是上述梅尔卡特制图法。”“这种不恰当地扩大和夸大欧洲、不恰当地矮化亚洲和非洲的世界史形象和欧洲‘大陆’观，简直就像既定事实一样普及开来。可以说，这实际上就是为以错觉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形象增加了地理学依据。”<sup>82</sup>

40年过去了，梅尔卡特制图法的缺陷早已是人所共知。然而，由此产生的历史观念是否得到了矫正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依然残留着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子。

杉山正明在其前引书中建言道：“无论如何，无论怎样想，以特定的国家·地域·文化圈为中心、完全从自我的视角出发来观察或截取人类以往的历史，由此而得出的世界史形象是不可能完善的。对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真实存在过的事情’，必须按照其本来所具有的轮廓和比重进行考察，由此得出的世界史形象才是适当的。只有这样的世界史形象，才是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所必需的。”“在此过程中，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究竟是什么东西将地域与地域、文化圈与文化圈连接起来、从而使得世界史成了真正的世界史？此外，在所谓世界史的总体形象中间，改变人与‘时间’的原动力又是什么？”“如前所述，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认识中，人们对游牧文明和游牧民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产生的作用和意义的理解是最具负面性的。在重新构建世界史形象的时候，如何真正地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就成为重要的关键所在。”“为了重新认识过去形成的偏狭的世界史、构建新的真正的世界史形象，就必须认认真真地重新把握游牧民族及其历史。与此同时，这也涉及到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有关近现代世界的现有结构体系的问题。”<sup>83</sup>

森安孝夫在其研究报告中，继前引处写道：“那是因为完全遗漏了欧亚大陆中部地区（东欧+中亚

+蒙古+西藏)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所谓东亚文化圈(包括东北亚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西亚文化圈、地中海文化圈以及欧洲文化圈的相互交往,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得到有机的说明。在欧洲势力依靠大炮和舰船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近代以前的历史过程中,欧亚大陆中部地区拥有世界上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和联系各个文化圈的地理条件,仅就这两方面的原因而言,不仅绝不能够忽视它的存在,而且应该认识到,缺少了它就不可能有什么世界史。”<sup>84</sup>

另外,森安孝夫在其《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中对“本书的结构与目的”进行说明的时候写道:“作为本书的读者,首先期待着的是高中的世界史、日本史和现代社会等课程的教师。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就已经走上社会并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日本人而言,他们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来自于高中时代的历史教育或者高考复习课。”“本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从与西欧中心主义史观和中华主义思想截然不同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视角出发、以简明易懂的笔法来表述迄今为止经常被人们提到的丝绸之路和唐帝国的历史。”“换言之,就是站在包括游牧民族和丝绸之路这两个方面在内的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历史的立场上,重新考察欧亚大陆世界史(即前近代的历史)。”<sup>85</sup>

## 结语:今后的展望

### 1、关于“元寇”这个术语

我们在此首先讨论一下“元寇”这一历史术语。川添昭二在其《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中曾指出:“根据笔者有限的知识,元寇这一术语应该是进入近世时期以后才逐渐固定下来的。享保五年(1270年),在呈献给幕府的《大日本史》本纪第六十三的弘安之役条目中出现了‘元寇’一语。”<sup>86</sup>自此之后,这个问题往往都会在时局变化之际、根据应对外部压力的需要而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

然而,中村直胜却在其“元寇还是蒙古来袭?”<sup>87</sup>一文中主张道:“文永·弘安之役是蒙古来袭,决不是元寇。”他认为: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蒙古只“是北方的夷贼,是蛮族”而已,朝野一致认为“这个‘蒙古来袭’的幌子非常重要”,“文永五年的国书中写着的是大蒙古国,因而文永十一年战争就是蒙古来袭。这确实不是元寇。因为弘安二年‘元’朝建立了,所以弘安四年的战争倒是可以被称作为元寇,然而在日本却并没有使用元寇这个词。”紧接着,他又写道:“元寇这种表述方式出乎人们意料地属于新造词语,可能开始于日清甲午战争或者日俄战争前后。作为一个鼓动我国国民同仇敌忾的情绪和面临大敌时敢于胜利的先例,应该是一种军国主义时代军国主义者的行为。”

杉山正明在其《忽必烈的挑战—通向蒙古海上帝国之路—》中也曾经指出过:所谓“元寇”一词,“应该是作为一种相对于中国文献中所使用的‘倭寇’的对立命题而创造于明治时期的词语。”<sup>88</sup>此外,他还以“‘元寇’与‘倭寇’”为题,做了如下考证式研究:“所谓‘寇’,意为偷盗、强盗,尤其特指‘毛贼’。”“从汉语的角度来看,‘元朝毛贼’这种称呼原本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至少在本人的学识范围之内,从当时直到近现代时期为止,在中国流传下来的汉语典籍、文献和记载中是找不到‘元寇’一词的。”<sup>89</sup>“这个词语的‘发明人’已经无法确定,说起来也许还带有开玩笑或讽喻的意思。然而,该词语恐怕与所谓的神国思想以及国体意识密切相关。对于日本人来说,‘元寇’这一表述方式和语感并不会引起十分负面的反应,因而逐渐被接受并普及开来。”<sup>90</sup>

总的说来,“元寇”这一术语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当今的中学历史教材之中。就我们所意识到的问题而言,今后有必要对此加以重新考量。

### 2、如何认识“与亚洲各民族的联动”问题?

前文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此处再举一例。在《新中学校 历史 改订版 日本与世界的历史》<sup>91</sup>中,编者在“元朝与亚洲的人们”这一标题之下写道:“元

朝制定了第3次进犯日本的计划，却因为中国南方地区和汉民族的叛乱、以及高丽、越南、琉球和萨哈林等地人民对元朝的抵抗活动而延期，最终则因忽必烈之死而终止。”

笔者认为，这段表述来源于旗田巍所著《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状况》。旗田巍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写道：“针对蒙古帝国袭击日本的企图，在蒙古统治之下的亚洲各民族，尤其是朝鲜人、还有中国人和越南人的抵抗活动，是迫使其侵略日本的计划遭受挫折和终止的主要力量。笔者在明确揭示上述事实的同时，考量日本与亚洲的关联。元寇不仅不应该成为赞美战争和煽动针对亚洲各民族的排外主义的素材，反而应该促使我们思考日本与亚洲的深厚联系。”

如前所述，旗田巍这部《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状况》出版之后，矢代和也曾这样评论道：“在最近几年间日本人民的斗争中，旗田氏这本书可以说是显示出了日本历史研究者终于能够到达的一个节点。”<sup>92</sup> 矢代和也的这种见解究竟反映出怎样的时代风貌？我们确实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最近，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从美国亚细亚财团和福特财团接受了研究资金。具体而言，这两个财团为了资助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向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和东京的东洋文库提供了17万3000美元的研究经费。然而，此事引发了学者们之间的争论。有人质疑道：研究人员如果接受了这种资助金的话，还能够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吗？难道就不会被美国的远东政策所利用吗？<sup>93</sup>

这一时期，旗田巍认为：亚细亚财团和福特财团的资助表明了一种对日本中国研究的肯定态度，而日本的亚洲研究在二战以前总是与日本的亚洲侵略政策结合在一起的，由此而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与美国的这种肯定态度却并不矛盾，因而有必要对学术研究本身进行深层次的批判。<sup>94</sup>

旗田巍的这种观点在学术界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支持基础。1945年8月，日本不得不接受《波茨坦

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被置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占领之下，实际上处于美国占领军的全面而严厉的管制之下。此外，随着国民党军队从中国大陆的败退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形势更加严峻。这种因素对日本的中国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举例而言，美国政府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处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政府也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这样一来，不仅日本与新中国的交往受到阻碍，而且有关中国的研究和调查活动也遭遇了重重困难。<sup>95</sup> 因而，不仅上述亚细亚财团和福特财团的资助金问题应该被置于这一背景之下来认识，而且旗田巍关于“元寇”的观点也应该从这种背景出发来理解。

自1990年代以来，在日本的东洋史学界，以杉山正明为首的一些学者一直在呼吁重新建构蒙古史形象。时至今日，可以说这种努力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正如前面已经引述的那样，杉山正明曾指出：“第三次远征日本的计划之所以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一般都会列举出诸如江南各地的叛乱、在越南的‘抵抗’活动等理由。然而，在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时候，却仍然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联想也缺乏说服力。”<sup>96</sup> 这种见解已经成为共识。

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一员，杉山正明的见解中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内容。旗田巍曾在其《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状况》的“前言”中中断言道：“作为客观事实，各地都出现了阻止蒙古来袭的运动。”现在看来这种断言是有问题的。只是关于高丽的问题可以另当别论，因为正如已经被证明了的那样，蒙古侵略高丽确实与远征日本有密切的联系。<sup>97</sup> 另外，我们必须指出：旗田巍的那句论断也是不容否定的，即“元寇不仅不应该成为赞美战争和煽动针对亚洲各民族的排外主义的素材，反而应该促使我们思考日本与亚洲的深厚联系。”

本文限于篇幅，似乎只是罗列了相关的问题点。

日本有日本式的全球化认同方式，也有关于日中韩历史认识的对话方面的积累。我们将在这些既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思考下去。问题似乎才刚刚开始。

【附图】现在的日本教科书都是彩版印刷，图录也越来越丰富。此处所介绍的《蒙古袭来绘词》中的一个局部画面，即竹崎季长在鸟饲潟苦战的场面，因其首次出现了火器而闻名。

上图以“激战元军”为标题，被收录在《高中日本史B 新订版》<sup>98</sup>之中。下图则来自《蒙古袭来绘卷》，以“激战蒙古兵的竹崎季长”为标题，被收录在《休闲日本史》<sup>99</sup>之中。本乡惠子指出：“《蒙古袭来绘卷》是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的基本史料，但是损坏严重，问题较多。攻击季长的蒙古兵和‘火器’是江户时代补加上去的。”<sup>100</sup>



【注】

- 1 参見野口周一:「国際交流についての一試論」(『新島学園女子短期大学紀要』第11号、1994年)
- 2 渡部昇一:「初の国難・元寇一勝者の悲劇」(原載于『日本史から見た日本人・鎌倉編一「日本型」行動原理の確立一』、祥伝社、1989年)一译者注。
- 3 前引書、第35頁。一译者注。
- 4 前引書、第36～37頁。一译者注。
- 5 野口周一:「東アジア世界のなかの蒙古襲来」(『総合歴史教育』第37号、総合歴史教育研究会、2001年)。一译者注。
- 6 野口周一:「明治期以降歴史教科書における蒙古襲来小考」(『共愛学園前橋国際大学論集』第2号、2002年)。一译者注。
- 7 野口周一:「蒙古襲来に関わる挿絵について」(『新島学園女子短期大学紀要』第22号、2002年)。一译者注。
- 8 野口周一:「歴史教科書における蒙古襲来に関わる挿絵一覧一筑波大学所蔵教科書を中心に一」(『新島学園女子大学紀要』第23号、2003年)。一译者注。
- 9 野口周一:「フーリア及びサッカー美術館訪問記一『蒙古襲来絵詞』参観を中心に一」(『新島学園女子短期大学紀要』第19号、2000年)。一译者注。
- 10 野口周一:「異文化社会間における人間関係論の確立に向けての提言一歴史教育の重要性を中心にして一」(平成14年度私立大学教育研究高度化推進特別補助『異文化社会間における人間関係論の確立』所収、新島学園女子短期大学、20003年)。一译者注。
- 11 永原慶二監修『岩波 日本史辞典』(岩波書店、1999年)、第1020頁。一译者注。
- 12 『日本歴史大事典』(第3巻、小学館、2001年)、第609～610頁。一译者注。
- 13 小林一岳『元寇と南北朝の動乱』(『日本中世の歴史』第4巻、吉川弘文館、2009年)。一译者注。
- 14 黒田俊雄『蒙古襲来』(中央公論社、1965年)、第59頁。一译者注。
- 15 同上、第61頁。一译者注。
- 16 石原道博、和田清編訳『旧唐書倭国日本伝 宋史日本伝・元史日本伝』(岩波文庫、1956年)、第21頁。一译者注。
- 17 愛宕松男『忽必烈汗』(富山房、1941年)、第149頁。一译者注。
- 18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角川書店1992年)、第247頁。一译者注。
- 19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興亡』(下巻、講談社、1996年)、第120～121頁。一译者注。
- 20 川添昭二『蒙古襲来研究史論』(雄山閣出版、1977年)、第23～24頁。一译者注。另外、关幸彦认为、这种观点曾被《大日本史》所采用。(関幸彦『神風の武士道一蒙古合戦の真実一』、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46頁)。一原注。
- 21 小林一岳『元寇と南北朝の動乱』、第21頁。一译者注。
- 22 愛宕松男在其《忽必烈汗》第149頁中写道:“我们不妨做如下理解:(蒙古国书)尽管没有正面表达露骨的威胁和挑战之意,也确实包含着不让作为第三国的我国倒向宋朝方面这一政策性意图。”现在看来,也许有必要对这段话进行重新理解。
- 23 愛宕松男『アジアの征服王朝』(河出書房新社、1969年)、第312～316頁。一译者注。
- 24 稲葉岩吉『日麗関係』(叢書『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1934年。一译者注。
- 25 松井等『黒山島と元寇』(『中央史壇』第2巻第4号)、1921年。一译者注。
- 26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第249頁。一译者注。
- 27 同上。一译者注。
- 28 小林一岳『元寇と南北朝の動乱』、第26頁。一译者注。
- 29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第250頁。一译者注。
- 30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第250～251頁。一译者注。
- 31 重松俊章「支那側より観たる元寇の役」(『史淵』第32号)、1944年。一译者注。
- 32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第251頁。一译者注。
- 33 小林一岳『元寇と南北朝の動乱』、第38頁。一译者注。
- 34 片倉穰「モンゴルの膨張とアジアの抵抗」(『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IV 地域と民衆』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92頁。一原注。
- 35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第252頁。一译者注。
- 36 海老泽哲雄的《关于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诸问题》一文曾专门论述过东方三王对蒙古帝国的重要性

- (参见海老澤哲雄「モンゴル帝国の東方三王家に関する諸問題」,『埼玉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社会科学)第21号、1973年)。一原注。
- 37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第252頁。一译者注。
- 38 野口周一「ハイドゥ / 海都 / Khaidu」(『世界歴史大事典』第15巻所収、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85年)第200～201頁。一原注。
- 39 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新聞社),1995年。一译者注。
- 40 同上,第189頁。一译者注。
- 41 同上。
- 42 同上,第190頁。一译者注。
- 43 同上,第192～193頁。一译者注。
- 44 同上,第194頁。一译者注。参见野口周一「歴史イメージの形成について」(『異文化社会間における人間関係論の確立に向けての提言』所収)。一原注。
- 45 旗田巍『元寇—蒙古帝国の内部事情—』(中央公論社),1965年。一译者注。
- 46 参见书评「黒田俊雄著『日本の歴史8 蒙古襲来』—旗田巍『元寇』・山口修『蒙古襲来』にふれながら」(『歴史評論』第191号、1966年)第49頁。另外,该书评还被收录于矢代和也所著《中世纪史研究与历史教育论—遺稿与追悼》(矢代和也『中世纪史研究与历史教育论—遺稿与追悼』、校倉書房、1991年)一书之中。通过对该书的解读,可以了解到作者那真诚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历史教育的热情。一原注。
- 47 片倉穰「モンゴルの膨張とアジアの抵抗」(『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IV 地域と民衆』所収)第89頁。一译者注。
- 48 中村和之「『北からの蒙古襲来』小論—元朝のサハリン侵攻をめぐる—」(『史朋』第25号、1992年)6～7頁。一原注。
- 49 早坂暁「國難—蒙古来たる」(『毎日新聞』1998年10月11日)。一译者注。
- 50 荒川秀俊「文永の役の終わりを告げたのは台風ではない」(『日本歴史』第120号、1958年)。一译者注。
- 51 川添昭二『日蓮—その思想・行動と蒙古襲来—』(清水書院、1971年),后改书名为《日蓮と蒙古袭来》(『日蓮と蒙古襲来』)。一译者注。
- 52 同上,第161～169頁。一译者注。
- 53 小林一岳『元寇と南北朝の動乱』,第33～34頁。一译者注。
- 54 井上江章「時局下に於ける元寇の教材観」(『歴史教育』第13巻第7号),1938年。一译者注。
- 55 歴史教育者協議会編『前近代史の新しい学び方—歴史教育と歴史学との対話—』(青木書店),1996年。一译者注。
- 56 鬼頭明成「中世国家と東アジア—『元寇』学習をめぐる課題—」(歴史教育者協議会編『前近代史の新しい学び方—歴史教育と歴史学との対話—』)。一译者注。
- 57 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東洋文庫),1931年。一译者注。
- 58 岩本賢治「次はどうなるの?—モンゴル襲来で推論する」(『歴史地理教育』),2009年6月。一译者注。
- 59 三橋広夫「中学生と学ぶ『モンゴルの襲来』の授業」(『歴史地理教育』),2009年10月。一译者注。
- 60 『中学社会 歴史 未来を見つめて』(教育出版、平成17年3月30日検定済)。一译者注。
- 61 安達弘『人物学習でつくる歴史授業』(明治図書、2001年),第129～140頁。一译者注。
- 62 参见岡田精一、吉井宏「歴史学習と学習指導要領の変遷」(『歴史教育と歴史学』所収、山川出版社、1991年)、中村紀久二『教科書の社会史』(岩波書店、1992年)、歴史教育者協議会「歴史教育50年のあゆみ」(『歴史教育50年のあゆみと課題』所収、未来社、1997年)。一原注。
- 63 『世界史B』、東京書籍、平成18年(2006年)3月30日検定済。一译者注。
- 64 『詳説世界史 改訂版』、山川出版社、2006年3月20日文科省検定済。一译者注。
- 65 参见上原いづみ「明治期歴史教育における『歴史画』の研究」(『筑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21号、2002年)、北原恵「教科書のなかの『歴史/画』」(『歴史評論』第634号、2003年)。一原注。
- 66 『高等小学歴史』(版權所有 文部省総務局図書課、明治24年(1891)刊)。一译者注。
- 67 参见太田弘毅『元寇役の回顧—記念碑建設史料—』(錦正社、2009年)。一原注。
- 68 「発掘を終れる元寇防塁の一部」(大正二年七月二十日),史蹟現地講演会編『元寇史蹟の新研究』(丸善株式會社、1915年)所収。一译者注。
- 69 大槻文彦著『校正 日本小史』(明治20年(1887)文部省検定済)。一译者注。
- 70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9巻、小学館、1976年),

- 第252頁。一译者注。
- 71 『新しい歴史教科書 改訂版』, 扶桑社, 平成17年(2005年)。一译者注。
- 72 参見『中学社会 歴史的分野』, 日本文教出版, 平成17年(2005年)3月30日検定済。一译者注。
- 73 村井章介『北条時宗と蒙古襲来』,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2001年, 第157頁。一译者注。
- 74 井沢元彦『逆説の日本史—中世神風編—』, 小学館, 1998年。本书是根据作者在『週刊ポスト』杂志1996年11月22日号~98年1月1・9日号上的连载内容整理而成。一译者注。
- 75 井沢元彦『逆説の日本史—中世神風編—』, 第212~213頁。一译者注。
- 76 野口周一「高校世界史における内陸アジア遊牧民の生活文化」(総合歴史教育研究会主編『総合歴史教育』第23号, 2000年)。一译者注。
- 77 竹村卓二「少数民族の歴史と文化」(『漢民族と中国社会』所収、山川出版社、1983年), 第333~335頁。一译者注。
- 78 杉山正明『逆説のユーラシア史—モンゴルからのまなざし—』, 日本経済新聞社, 2002年。一译者注。
- 79 杉山正明『逆説のユーラシア史—モンゴルからのまなざし—』, 第36頁。一译者注。
- 80 森安孝夫「世界史上における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意義」(『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 大阪大学, 2003年, 第266頁)。一译者注。
- 81 前川貞次郎「メルカトル世界史像—大いなる錯覚—」(『図書』1968年12月号, 岩波書店)。一译者注。
- 82 前川貞次郎「メルカトル世界史像—大いなる錯覚—」, 『図書』, 第29~33頁。一译者注。
- 83 杉山正明『逆説のユーラシア史—モンゴルからのまなざし—』, 第38~39頁。一译者注。
- 84 森安孝夫「世界史上における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意義」(『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 大阪大学, 2003年, 第266頁)。一译者注。
- 85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興亡の世界史』第5巻, 講談社, 2007年), 第25頁。一译者注。
- 86 川添昭二『蒙古襲来研究史論』, 第15頁。一译者注。
- 87 中村直勝「元寇か蒙古襲来か」(『史迹と美術』第45集第6号, 1975年)。一译者注。
- 88 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 第187頁。一译者注。
- 89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時代のアフロ・ユーラシアと日本」(『モンゴルの襲来』(『日本の時代史』第9巻)所収, 吉川弘文館, 2003年, 第122~123頁)。一译者注。
- 90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時代のアフロ・ユーラシアと日本」(『モンゴルの襲来』第124頁)。一译者注。
- 91 『新中学校 歴史 改訂版 日本と世界の歴史』(清水書院, 平成17年3月30日文科省検定済)。一译者注。
- 92 参見本文“注46”。一译者注。
- 93 野口周一「中国研究」(『地域研究入門—多文化理解の基礎』所収, 開文社出版, 1997年, 第45~46頁); 伊藤一彦「日本の中国研究」(『岩波講座 現代中国』別巻2所収, 岩波書店, 1990年, 第21頁)。一原注。
- 94 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伝統」(『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歴史学の方法とアジア』所収, 御茶ノ水書房, 1966年, 第205頁)。一原注。
- 95 野口周一「中国研究」(『地域研究入門—多文化理解の基礎』, 第41~42頁); 江副敏生「現代」(『中国史研究 入門』下巻所収, 山川出版社, 1983年, 第489~490頁)。一原注。
- 96 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 第189頁。一译者注。
- 97 参見李益柱「蒙古帝国の侵略と高麗の抵抗」(『歴史評論』第619号, 2001年)。一原注。
- 98 『高校日本史B 新訂版』実教出版, 2010年, 第67頁。一译者注。
- 99 『プロムナード 日本史』浜島書店, 1999年, 第64頁。一译者注。
- 100 『全集 日本の歴史 第6巻 京・鎌倉 ふたつの王権』, 小学館, 2008年, 第248頁。一译者注。



【付記】

本稿は、上海市の華東師範大学歴史学系のお招きを受け、2010年9月25日に同大学で開催された「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歴史教科書：国際比較研究」における私の発表を論文として纏めたものである。

本稿は郭海良教授の手によって中国語訳され、『文化和教育視野中的国民意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0月）に収録される予定であったが、不掲載となった。

郭海良教授の翻訳の御苦勞に感謝するとともに、私と教授との友情を記念すべく、ここに掲載した次第である。



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Specialists in Global-Age History Textbooks  
—On the Descriptions of *Genko* (the Mongol Invasions) in Japanese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Shuichi NOGUCHI Hailiang GUO (tras.)

**【key words】**

Global-Age, teaching history, *Genko*, the Mongol Invasions